

社会学论文集

第一辑

甘肃省社会学会

社会学论文集

第一辑

甘肃省社会学学会

目 录

甘肃省社会学学会召开成立大会（综述）·····	1
关于边疆开发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些意见·····费孝通	3
社会学与现代化·····王 康	12
移风易俗、除旧布新·····陈 煦	35
系统动态学方法与社会学·····李贻武	40
人才，教育社会和社会教育·····赵成文	56
我国当前人才培养与使用中心 的几个问题·····候玉臣	73
科技干部制度改革与人才开发·····郑本法	86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时期 的知识分子·····樊安群	98
应当突出关心民族地区的智力 开发和人才使用问题·····延涛 蒋克强 周文武	118

社会主义法律是维护男女平等

的重要武器……………胡永旭 133

如何提高劳动改造罪犯的质量……………赵西 143

西北的环境与移民……………原华荣 162

兰州市劳动力状况的初步分析……………王 燕 178

甘肃省社会学理事会名单…………… 191

甘肃省社会学成立大会暨第一次

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名单…………… 193

祝贺单位名单…………… 186

甘肃省社会学会第一批会员名单…………… 199

甘肃省社会学会召开成立大会

甘肃省社会学会于1984年9月16—20日在兰州召开成立大会，并举行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

全省科研、宣传、文教、计生、政法、新闻等部门的社会学专业工作者、业余爱好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共一百零五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同志，著名社会学家王康同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韩明谟同志，以及陕西、贵州、河南、湖北、天津、重庆、新疆、宁夏等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参加了大会，并向大会致词祝贺。

江苏省社会学会、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天津社会学院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研究所、甘肃省伦理学会、陕西省法学会西北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室、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分会、甘肃省人口学会平凉分会等学术团体和个人分别向大会发来了贺电和贺信。

大会收到学术论文、调查报告、学术资料共38篇。与会代表就智力开发与人才流动、教育机会与社会教育、西北环境与人口迁徙、城市老人与社会福利、社会学调查方法、宗教与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青少年犯罪与综合治理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论论。

会议讨论通过了《甘肃省社会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由25人组成的甘肃省社会学会理事会。陈煦同志为名誉会长，谷苞同志为学会顾问，伏耀祖同志为学会会长。

会议期间，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同志与前来参加会议的其他省、市、自治区兄弟单位的同志进行了座谈。大家一致认为，为了促进社会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全国社会学界需要进一步加强联系。通过充分讨论，初步达成了以下三个协议：

一是向全国社会学界倡议，召开全国性的社会学理论会，讨论使社会学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下去。

二是建立边远地区协作关系，成立边远地区社会学研究工作协作区，共同研究带有共性的社会问题。

三是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大家共同编写《社会学讲座》（共15讲）；先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播讲，后汇集成册向全国发行。

大会开得生动活泼，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984年、9、27、（郑本法）

关于边疆开发和社会学 研究的一些意见

——费孝通在甘肃社会学学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六日）

“在甘肃省社会学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同志：

我很高兴，这次来正好碰上甘肃省社会学学会的成立，当然，这也是你们的有意安排。首先让我代表中国社会学会向大会祝贺！

我想到西北来，时间已经很久了可是一直都没来得了，这还是第一次。不只是甘肃，陕西、青海我都没有去过，里们国家这么重要的一块地方，我一直没有机会来看一看我这很遗憾的！现在虽然七十几岁了才到这儿来，但心是却，很愉快的。

去年耀邦同志提出种草种树，全国人民都很拥护。今后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中心要转移到西北来，而种草种树是开发我们西北的第一步。去年中国民主同盟派出了一个专家小组，来调查这个地区种草种树情况，建议让我们智力支援边疆。我去年没能来，因有别的事情。今年我总算来了，同我一起来的同志中有搞水土的、有搞牧草的、有搞畜牧的，有搞昆虫的，他们都是有专业的。我自己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今后再能到西北来，开展一个开发大西北的调查。

前年，黑龙江有位同志已经开始研究移民问题。现在我希望再扩大一点，作一个开发边区的调查研究。上个月我去了内蒙古，内蒙当然很大，我只到了赤峰市，跑了二十几天时间，看了看这个边疆地区的草原、畜牧业等问题。想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上半年，召开一个黑龙江、内蒙古的调查汇报会。到时候，还想请甘肃、新疆、青海、宁夏、陕西的同志们去。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他们的调查的经验，他们的成果，看看能不能在其他的省份推广，扩大研究范围。

这次我本来不准备讲什么话，因为昨天跑了一天路，不那么太舒服。可是，我既然来了，就得讲一下。讲一下社会学的发展情况。

社会学的重建工作是一九七九年才开头的。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要把社会学再搞起来。认为过去把社会学取消了，是很不对的。相信社会学会为四化建设出力量。任务提出来了，很多人还有一些顾虑，觉得这个东西不好搞。我自己也有顾虑，这个担子不轻，要再搞，不是说把过去的东西拿出来就行了，不是说我们把几条原理式的东西搬出来就算数，就能解决问题。我们要搞的是我们新中国的社会学。它不同于解放前在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在解放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党要求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学，这必须清楚。我们搞社会学。不能从外国搬，从美国搬不行，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从苏联也不行，他们也不同于我们，从哪儿搬，都是不行的。不过我们过去有些基础，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创造。

世界各国都有社会学这门学问，可是怎么把它运用到中

国来，在我们中国土地上创造出一个适合当前我们中国社会所需要的、研究中国社会的学科，研究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为我们的四化建设服务。乔木同志同我们一起研究，得出了三条，大家可能已经看见过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最根本的一点，是绝对不能动摇的。然而，我们不是靠空想就能解决问题。不结合实际的是不行的，不解决实际问题更不行。我们要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我们急需了解的是当前的社会。当前离不开过去。当前社会上发生的各种问题，都和过去的社会有关的。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社会呢？为的是要搞现代化。我们需要创造，一个为四化服务的社会学。这个任务是相当大的。

一九七八年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整整讨论了一年，那时大家考虑得很多。后来乔木同志说，不管怎样，社会学这门学科非建立起来不可，这是中央的决定，也是我们的任务，一九七九年三月我们就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我们的力量是很薄弱的，但也有一个优点，就是大家都很虚心。我们要在过去已有的基础上，真正重新学起，到实际中调查、研究，来丰富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知识，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中国的社会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要做这件事，就要有人。靠我们几个老头是不行的。就象乔木同志说的，不要等到开了追悼会再在大学里成立社会学系。学术这个东西不是拍拍脑

袋就能拍出来的。要去认识中国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民族成份又这么多，是不容易的。所以必须培养一批年轻的能做社会学工作的人。这就要从我们开始，把过去研究过社会学和当前对社会学有兴趣的所有愿为社会学出力的人都团结起来，成立一个学会。目的就是让大家一起来提倡、宣传、研究社会学。成立学会，是我们走的第一步。光有学会那还只是有了空架子，总得有一个机关来做具体工作，要有个比较固定的编制，所以我们决定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研究所。这是第二步。

有了一个学会，有了一个研究所，我们通过这两个机构办了几期学习班。因为大学培养要四年，在研究院要二年，办年之后上课教书还不行，再等几年才能上阵，算起来大体就到一九八五年才能第一批新人，这太慢了！不行。所以，我们先要从其它学科调转来一些人。这方面，教育部出力不少，它把各大学、各个研究所或部门的一批年轻同志请到北京去，聚在一起，我们才办了几期学习班。这就是说，种子播下去了。靠这些种子培养成教师，大学里才能办社会学系。这本书（指《社会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整理者注）的开头就讲这段话，是根据乔木同志要在各大学办社会学系的意见开始工作的。要办系不容易，上课必须有教员，有教员就得有教材。我们办学习班就是为了培养学员。教材怎么办吧？我们当时就请教育部帮助，让各大学派人来参加学习班的学员留下来共同备课，准备开讲社会学概论。他们花了半年功夫，开始写出东西来了。底稿拿出了大家一看，说是就三不四、不象样子。我说很好，不三不四就得有三有四！

对不对？我们每天都在长大嘛！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反复讨论，反复修改，直到今年才出了这样一本书（指《社会学概论》——整理者注）你们再把它送给我，我很高兴。这么一本书，在北京还没有上书店就被卖完了。因为这个本子我们还没有把握，还要进一步修改，所以叫作“试讲本”。它还不是定稿，大家可以提意见，而且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边，整个能重新写一下，那就好了。现在我们至少有这一本社会学课本了。有了这个本子，学生就可以念了，教员也就可以教了。讲得好不好，大家来发展，靠大家、靠群众的力量。要把这本概论充实起来才行。我们必须开展调查研究。我们要摸清中国社会的底子，利用中国社会的材料来讲中国社会。我想起我自己进大学时，五十年前，社会学用的还是英文教科书，讲的是外国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读了几年社会学只知道些外国社会，其实由于没有过去外国，也不会真正了解外国。当然不是说外国的书本对我们没有用，但必须立足于中国自己的实际来研究。

最近这两年，我们成立了四个社会学系，它们分别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和上海大学。其他还有很多，大学都开了社会学课程。当然，我们也不主张一下子都摊开，因为我们力量不够。要开一个系，就得做好多基础工作，教材都得准备起来。这几年基本上也快准备出来了，比如说《社会心理学》写出来了，有点基础了。《社会调查》、《社会研究方法》还没有定稿。《比较社会学》是把各种不同模式的社会进行对比，在比较中进行研究，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至今还没有人动手准备。社会学的教学问题也值得进一

步研究。各门课程都得有本本才行。现在本本还没有都出来，我希希从今年开始，一本一本都能写出来，印出来。

有了大学，有了系，有了书，还要给学生充分的参考资料。这就需要做调查。我自己也要投入到调查工作里面去。这两年来到处跑了跑，做了几个调查。刚才的报告（指《关于筹备甘肃省社会学学会情况》报告——整理者注）就很好。甘肃很有成绩，不管水平高低，我们大家首先把这个事情重视起来了。什么叫水平高？就看你解不解决问题。人家就看你讲的是不是事实，是事实，抓到要害，讲出了个道理来，人家就会重视你。所以我们不要怕，大家一起干，要互相推动、互相帮助、互相提意见、相互批评，采取这个方法，来建立我们的社会学。

讲到这里，我想谈一下我自己的打算。我这一生的时间很短了，假定说我能活到八十岁的话，我只有五年半的时间了。这五年半我就得好好用，马马虎虎是不行的！我想尽量地集中精力调查研究一两个课题。当然有些事务还得我做，有些会议还要我去参加，但我想把主要力量放在研究上面。

过几天我要参加一个人口问题讨论会，我的看法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了，这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要养活这么多人口，还很吃力。反过来说，这么多的人口又影响了我们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这个道理，现在大家都承认了。如果我们早听马寅初的话，全国就可以少三亿人口，现在就好多了。当然有！爱多生几个孩子，有了女孩的，还想生个男孩，这种思想到现在还有。总的说来现在大家都觉到人口不能再多了，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人口还要

增长，到二〇〇〇年估计还要增长两亿多人。两亿人口可不少呀，一个上海才一千万人口，两亿人口就要二十个上海。十六年里要我们建成二十个上海，恐怕没有那么大的本领！这点，到时候又是个大问题，大家又会埋怨我们为啥不早说，所以当务之急是我们要赶快发展生产。但怎么发展？怎么安排？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现在要研究发展小城镇问题和开发边区问题。

关于发展小城镇，今年的十号文件里边讲了，40%的人口要安排在小城镇里边。小城镇过去一直认为人越少越好，因为它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现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生产大发展了，就要求农产品实行商品化，商品化就要有个地方来经营商业，就需要加强小城镇建设。发展小城镇的问题不是什么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中国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的觉悟。起初不许搞，但还是有人搞，一搞出来，结果很不错。现在看来它还真是一条发展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这道理在哪儿呀？就要我们来研究。人们已经做了，就是要我们讲个道理出来，使大家能理解它，看到它的意义，帮助它的发展。

关于开发边区问题。在内蒙我们的政策是要发展牧业。但是怎么发展牧业？为什么要这样做？这道理在哪里？这个就要我们去研究。只翻书本没有用，不大可能翻得到，即使翻到了，也不一定解决问题。还得实际去看，帮助总结经验。要到现场去，只靠间接的方法不行，靠不住。不能单依靠人家的劳动，要自己劳动，靠人家劳动而咱们只作传声带是不行的，要尽量下去实地观察。我自己虽然老了，跑不动了，但调查时还要

一家一家去访问，不能马马虎虎，听听就算，听汇报不算调查。人家调查，我们听汇报，这当然比不听要好些，然而要下去，就要实际去看。过去说“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个方法仍然是对的。这样才能跟群众接触，才能听得到群众的真心话，转过来为他们服务。过去解放军给群众挑水劈柴，群众什么真心话都说，成了一家人。如果好象钦差大臣，下去就没有多大用处。我现在不行了，出去也只能是探探路，找点问题，提些设想。我希望年轻人多下去调查，把情况反映出来，整理出来。问题被我们抓住了，就可以设法解决。

我出生的时候，受着帝国主义的欺压，解放后，翻了身，情况好多了。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很好改善，老百姓还很苦，他们没有都富起来，生产也没有很快发展起来。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才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只有几年功夫，我们的社会生活面貌就大为改观。我的家乡就是一年一个面貌，一年一个样子，一年一套问题，变化很大。江苏今年发展更快了。甘肃这个地区，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个别地方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水土流失，生态平衡都给破坏了，所以要种草种树，保护生态平衡。由于我还不知道它的具体情况。因此这次来要好好看一看。

如果边区不发达，我们全国也就兴旺不起来，只靠一个沿海发达起来，造成一个很不平衡的状态，那问题还会很多。所以要靠东部沿海的力量，来开发西部的边区。那么怎么办好，就要我们研究。总的说来，我认为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必须赶上甚至要超过东部，这一点是做得到的，因为它些的

点低。

这里还有一个民族问题。在边区，少数民族问题是怎么产生？它的历史过程怎么样？今后应该怎么样办？么题起流都值得研究。如果上帝保佑，再给我五年的工作时间，这我意集中力量帮助一些年轻同志研究这些问题。什么叫水土愿失，怎么防止水土流失？要实地看一看才能有正确的认识。只靠讲解，只靠电视，只看书不行。甘肃到底怎样才能发展起来？只有实地看看，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明天我就得下去，所以不能把这个会参加到底了，很对不起。当然这也是为了大家，我先去探探路，我希望明年再来一趟，到民族地区，到甘南等等去看看，亲身体验体验。

时间快得很，我时间也不多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的下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都是年轻人，身体也很好，这就好了，这样我们就有几代人了。可是要把这个班接下去，也不容易，不费苦功，不肯吃苦，不肯自己去观察，只是呆在上面写文章不行。这样我们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甘肃的知识分子身上负担相当重，我们还要动员内地和沿海的知识分子、学者、专家来支援甘肃。但主要力量不能靠别人，而要靠自己。要靠自己培养一批人。耀邦同志讲：我们今后一段历史的中心是在西北，因为大西北的资源很丰富。但这要花很大的劳动，要吃很大的苦头，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希望大家努力。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马廷旭根据录音整理）

社会学与现代化

——王康在甘肃社会学学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七日）

（一）现代化在我国的历史

今天，我给同志们讲讲社会学与现代化。现代化问题，在我国并不是以在现开始的。最早比较有意识地发展现代化是张子洞时以武汉开始，成比张之洞更早一些，这已是一百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我国就已有现代化的意识了，只不过还没有“现代化”这个词罢了。实际上我们国家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已经衰落，但我们还不自觉，我们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和外国没有接触。所以我们究竟落后到什么程度，自己还不知道，还夜郎自大。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大英帝国主义用大炮攻开了我们的大门，于是，一部分先进的仁人志士才开始觉察到我们国家的落后，看到了要赶上当时的世界水平，是需要作一些努力的、追究一下这个过程，起初我们只是感到西方的船坚炮利，比我们强，不过如此而已。要想向西方学习，买它的枪炮也就行了。但结果证明不行：第一我们买不着好枪好炮，第二即使买来了也没有多大用处。

到十九世纪后期，这批仁人志士就意识到光买船炮不行，还是要搞工业，开工厂。道理很简单，因为买这些东西来，又要学管理，又要学用，反而花了很多本钱。随之就出现了一批工厂，但是结果并不进步，并不现代化。因为这些当年现代化的工业、工厂，还需要用当年的水平来管理，而我们中国不行。而且，张之洞底下的那批人，都是一批满清官僚，非常肮脏，非常无北，让他们来搞，注定失败，结果也是不成功的。戊戌变法，涉及到了反封建内容，从整个满清帝国政府，到各个省区，郡县都搞宪法，当时讲机构要改变，但是结果也归于失败。

所以，我们讲现代化，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在一百年以前，我们的前辈在这方面就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以后不许变法改革，因此革命也就发生了。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一直到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为了把我们的国家从根本上加改造，然后使我们的国家走上现代化。这样的历史内容很丰富，我把它现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希望有兴趣的同志深入研究。

关于现代化，解放后应该说条件是很好的。五十年代那段历史，时间不长，可由于制度的变革，在短短的五年（49～56年）中间，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不仅医治好了国民经济的烂摊子，而且有了很大发展，这归根到底是由于我们社会制度的改变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有所调查。到了八大，我们更是明确起来了，我们要搞建设。可在后面这段历史中，左的东西开始冒出来了，逐渐占居统治地位，发展到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内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